

核心阅读

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全球化的逆转，但由于当今世界并未遭遇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1929—1933年大危机那样的灾难性冲击，即使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影响，一时或有挫折，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经济全球化的大势绝不会发生逆转。

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稳定向好态势，但世界经济增长依旧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单方面发动贸易战，更使逆经济全球化言论甚嚣尘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已步入穷途末路？

经济全球化正遭遇逆风

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不断抬头。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公开宣扬“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的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意大利民粹政府的上台，以及由一群愤怒的、对现状不满的底层选民形成所谓的“大西洋愤怒联盟”，都表明在全球化经济中未明显得利尤其是就业受到冲击的民众正在通过选举政治不断加剧保护主义倾向。曾经是经济全球化旗手的美国似乎正在逐步“去全球化”。特朗普公开宣扬“雇美国人、购美国货”，奉行“新孤立主义”路线，上台后签署的第一份总统令就是启动美国撤出12个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随后又下令就北美自贸协定（NAFTA）重新展开谈判，宣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颁布移民限制令。更为恶劣的是，挥起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大棒，悍然向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发动贸易战。

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际贸易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增速，但金融危机发生后，贸易增速明显放缓。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国际贸易增速从1990—2008年均7%降至2009—2015年间的3%，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国际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尽管2017年全球贸易以4.7%的增速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与危机之前的增速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贸易增速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是根本原因，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是直接原因，而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严重制约了全球贸易的回暖。

国际资本流动出现萎缩。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资本流动明显萎缩。因全球供应链增长停滞、贸易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从2007年的1.91万亿美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1.52万亿美元。其中跨境并购从2007年的1.03万亿美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6660亿美元。跨境并购是社会化生产在全球扩展的表现，该数据的下降体现了企业配置跨境资产兴趣的消减。

地缘政治经济风险明显上升。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每一次全球重大的政治、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有可能导全球化的停滞甚至逆转。例如，一战的爆发曾导致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中断，即便在战争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仍然如此。近年来，东欧、中东和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角力不断加剧，以及部分地区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势力的结合，加大了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的上升将进一步损害商业和市场情绪，从而削弱国际投资和贸易。

经济全球化仍有巨大推力

尽管遭遇逆风与阻力，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当前，国际贸易增速放缓、跨境资本流动下降等现象，更像是处于迈向新一轮全球化的转型期。

全球化正在遭遇逆风，但仍有声音与力量在不断与之抗衡。G20峰会一直在积极协调相关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促进全球贸易和投

资，反对保护主义。2016年9月举行的G20杭州峰会形成了“杭州共识”，达成了《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等重要的经贸合作成果，承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开放型世界经济。2017年的G20汉堡峰会的主题为“塑造联动世界”，再议包容性增长。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力。金砖合作机制一直高举全球化大旗，习近平主席在今年7月27日出席纪念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10周年非正式会议时强调，金砖国家应该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努力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其他与会领导人也表示，我们要携手同行，坚持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很多不同声音。在今年G7峰会召开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发文，直言特朗普可能不在意自己被孤立，但同时“我们也不在意在有需要时，仅签订一份六国协议”，强调美国以外的六国，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市场地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批评华盛顿的关税措施“可笑”。而传统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构仍在发挥作用。无论是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三大支柱”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以应对全球化挑战、把握全球化机遇为宗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等，都是积极倡导、力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经济全球化呈现新形式。一是服务业跨境转移速度加快。近年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一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而服务贸易增速则一直高于全球经济增速，服务贸易逐渐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二是跨境人员流动持续增长。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不只是表现为跨境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还有第三种形式，即跨境人员流动。三是作为经济全球化新形式的跨境数据流动获得快速发展。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6年报告《数字全球化：全球流动的新时代》（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显示，2005—2014年，

全球数据流量增加了45倍，预计之后5年还将再增加9倍。基于数据流动而产生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新生力量。首先，数据跨境流动使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在数字全球化的今天，原先在实体世界中不具备跨国经营规模的众多中小企业，借助网络平台，同样可以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上的“节点”。其次，数据跨境流动也方便人们在世界各地获取自身所需要的商品与服务。再次，数字经济可以克服劳动力跨境流动的障碍。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可以看成是经济主体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套利”活动。由于劳动力大规模跨境流动面临着政治阻力，因此难以就各国的工资薪金差异展开“套利”。然而，数字经济和“远程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将克服以上困难，使更多的人从事跨境远程工作。今天，数字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比货物贸易更大。这是各经济体之间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新型流动和互联关系。在数据、新闻、娱乐都能在互联网上实现全球共享的时代，认为全球化已经停滞或者逆转的说法，确实不太具备说服力。

经济区域化势头迅猛。当特朗普退出TPP之后，2018年3月太平洋两岸的11个国家签署了新版协定，将其更名为“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近期，欧盟与日本签署自贸协定，美欧达成自贸协定共识。在亚洲内部，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被各国列入优先议程，成为迈向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步。区域经济毕竟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区域内部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也就意味着世界经济整体依存度的上升。况且，有一些区域性规则体系向全球范围推行。只要能够努力减少区域性经贸组织的排他性，增加其开放性，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部分的区域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势必能更好地促进前者的发展。

从宏观角度视角来看，经济全球化进程离

印度如何破解创新困境

□ 周及真

印度外包研发产业正向高增值服务部门转型，其溢出效应十分明显，在提升本国民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高速增长。印度创新未来虽前景广阔，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与通常所说的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健康状况、贫困程度这些显而易见的“硬件”相比，教育体制的欠佳、人才培养机制的缺陷、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善、风险资本市场活力不足等重要的体制机制——“软件”问题则更为突出。面对创新的各类深层次困境，印度政府、企业、高校各自在破解之路上不断寻求出路。

积极重构高等教育体制

宏观教育体制的创新终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2009年末，印度中央政府尝试授予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的科技高等学院前所未有的自治权，使其能根据市场要求自行设置课程，配备的师资团队中有一半是印度顶尖的科技教授，从而培养真正符合现实世界市场需求的毕业生。同时政府也开始调整法律制度，允许国外大学在印度设置分校。为解决空间科研机构人才不足的窘境，ISRO计划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创建印度第一所“太空大学”——印度空间科学技术研究所（IIST），开设有关推进装置、空气动力学、航空学、航空电子工程学以及控制系统等课程，旨在为发展印度卫星和火箭事业培养和输送合格的高端人才。

改进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印度企业正努力寻求破解高端人才不足这一难题的新路，如印孚瑟斯（Infosys）、塔塔（Tata）、威普罗（Wipro）等信息产业引领者们纷纷与高等院校合作，建立世界一流的校园，每年招收上万名学员；选派企业中的科学家作为访问学者，开设与企业业务相关的硕士学位项目和课程训练；针对前沿科技问题，定期组织研讨班、讨论会、座谈会、讲习班等多种形式的互动教学，从而为教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因特尔（Intel）公司也正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张其技术人才供给：首先确认其在商业技术和管理技术方面缺乏的技术人才；随后与高校紧密合

作，作为智库与印度理工学院（IIT）坎普尔校区结成联盟，针对本科生开发多核处理器等类似前沿课程；最后，运用逐级培育的串联模式，形成与全印度200多所高校合作的人才培育规模，并最终引进这些高校的毕业人才。另外，很多企业都开始接手国有职业培训学院，并将其打造为与现代产业相关的前沿培训机构。

除了教育培训，很多企业开始从海外搜罗可能归国的印度人才。约翰·E·韦尔奇技术中心主任吉尔勒莫威尔指出，几乎每所世界大型科技大学都有300到400位印度专家，而GE公司正从这些大学中搜罗人才，说服那些最优秀的印度科学家回国发展。印度高校也开始积极寻求雇佣非本国教授（也包括在印度出生的外籍教授）来印度教学。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印度人才流失的问题已有所改善。几十年前，印度理工学院中超过75%的毕业生都选择移民到美国，而现如今这一比重已降到接近10%。人才回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印度各类经济机遇的增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设立内部知识产权制度

针对印度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很多企业不断进行尝试性探索。与外部知识产权立法相对应的，很多企业通过设立内部知识产权制度、制定一系列政策、采取一系列实践措施，从而防止企业知识产权泄露。这种内部知识产权制度包括很多要素。

很多跨国公司将其创新活动分割化。印度实验室研发的药物只着重于治疗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而不扩展为全世界轰动的药品。这些药物的经济回报潜力是极其有限的，如结核病在发达国家不常见，但世界上最穷困地区的人民却无力支付其治疗费用，因此药品研发需大量费用却很难收回投资，但同时其知识产权泄露的潜在风险也比发达国家重点药物低得多。

很多企业在员工入职第一天起就强调职业安全意识培训。如因特尔公司开设数据安全课程，反复向员工灌输个人和团队维护专利权的使命感；同时组织知识产权比赛，并由团队就申请专利展开竞争。

企业基于机密程度对文件分类，进而管理知识产权。如因特尔的特定文件和数据只对一小部分人员开放，即使在网络上也只许

不开两大推动力。一是科技进步，它和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能让跨境流动更加便利。正如蒸汽发动机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化，今天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仍然推动着全球互联，例如互联网技术正在各领域呈现革命性影响力，时间上永远在线、空间上联结一起，不断开拓全球化的新空间。二是政治力量，维系着开放的世界。目前，就经济全球化而言，似乎政治上的阻力在不断的增强，保护主义政策蔓延。这一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内部分行业萎缩，抢夺了就业机会，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然而，这些所谓的不利后果与其说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不如说更大程度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因为技术进步会使得某些行业获得更多益处，例如机器人的推广使用，使得工人的就业机会受到了影响。但往往很少有人对更先进的生产力表示反对，而全球化却成为了口诛笔伐的“万恶之源”，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言论不绝于耳。但相对于科技进步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政治上的阻力仍然相对较弱。更何况，反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投票反对全球化的那些人，因为开放不足、竞争不充分会制约生产力提高，从而减少就业岗位供给，影响中产阶层的收入增加，而中产阶层收入减少恰恰是当前逆全球化论调的主要理由。

逆经济全球化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将持续处于不断角力之中，前进还是倒退，向左还是向右，将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全球化的逆转，但由于当今世界并未遭遇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1929—1933年大危机那样的灾难性冲击，即使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影响，一时或有挫折，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经济全球化的大势绝不会发生逆转。

战略视角

打印而不许拷贝。

另外，一些企业如因特尔每年进行风险分析评估，每个工程团队都需回顾潜在的知识产权曝光风险。考虑到由研发与相关产业高速增长带来的高营业额，核心员工很可能被其他企业高薪聘用，因此他们离职前须参加一个必要的离职面试，签署一份协议以确保服从一系列的特定法律条款限制。

充分激发风险资本活力

部分风险投资基金明确以技术创新为目标，全力支持科技型初创企业。印度创新基金（The India Innovation Fund）已多年跟踪初创企业，正寻求投资致力于印度市场的创新驱动型初创企业，而这一领域内资金极度匮乏。近年来，印度初创企业交易流程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不仅因为海外印度人才的大量回流寻求发展机遇，同时国内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年轻人也将企业家视为未来的职业追求，有经验的企业高管也纷纷辞职重新创办企业，更重要的是快速成长和相对公平的国内大市场、更多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出现。因而，印度目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为创新驱动型初创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天使基金也更加活跃，很多享誉硅谷的天使投资者都为印度从农业到旅游业在内多个领域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弥补了市场上不到300万美元的基金缺口。印度天使网络（Angel Network）基金通常向一个公司投资100万美元，而后各留出3到5年时间，给企业运作初始公共供给、并购、战略销售等多个流程；如超过100万美元，则需通过企业联合组织（辛迪加）完成。

另外一部分风险投资基金如红杉（Sequoia）则明确遵循资本增长模型，构建企业家精神集群。Helion公司顶住风险，将软件企业传统优势资本化，并将其服务供应转变为基于因特网的产品供应；这种属性确保了产品能在相对低风险的前提下快速抵达市场，并有能力克服市场准入问题。很多依靠风险资本起家的企业也都在开发各类软件产品，用以提升办公室生产率、支持移动网络广告、实现人口数据可视化等。

他山之石

（上接1版）新的长征路上，“雪山”“草地”横亘在前，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思想和行为都是极其错误的，共产党员绝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时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革命热情、革命干劲，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大是大非敢于过招亮剑，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在攻克硬骨头、跋涉深水区、跨越地雷阵、冲刺决胜点上，敢想、敢做、敢当、敢为，勇做时代的“劲草”“真金”“先锋”“旗手”。

“勇立潮头、甘于牺牲”的英雄情怀

中华民族崇尚英雄。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英雄豪杰的品质和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若问何花开不败，英雄创业越千秋”。为什么我们的身边，总有这样一群人，令人敬仰、催人奋进？因为坚如磐石的信仰，点燃了他们的精神，如熊熊烈火生生不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总有这样一群人，锐意进取、敢为人先？因为改革创新的精神，融入他们的血液，如滚滚海潮澎湃向前；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总有这样一群人，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因为伟大的事业，激励他们的斗志，如苍茫大地坚韧无比；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总有这样一群人，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因为心底无私天地宽，千千万万个平凡普通的共产党人挺起坚实脊梁，如绵延群山巍峨耸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阔历程中，始终顶天立地、砥柱中流？因为他们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辉耀苍穹。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我们更应大力弘扬伟大的英雄情怀，让英雄精神永远镌刻心中，历久弥新，永不褪色，代代相传。

“淡泊明志、行稳致远”的笃定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

汉’的进取精神”。定力犹如“定海神针”，真正有定力的人，“连魔鬼都拉不走”。当前，有些党员干部“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根本原因还是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缺乏定力，怕风险、怕失败、怕担责。最近中央专门出台意见，提出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营造上下同心同向的干事氛围。我们要深切体悟中央关爱、支持、保护干部的良苦用心，深刻理解中央培养、锻炼干部的真实意图，既要坚持大胆工作、不怕失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又要防止纪律“松绑”、作风“减压”、曲解担当、胡乱作为，用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锻造战略定力、政治定力和行动定力，面对大是大非稳得住，面对诱惑欲望稳控制，面对困难挫折不动摇，抵制渗透，战胜围猎，不被俘虏，洁身自好，带头立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中成就事业、出彩人生。

“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学习情怀

卓越是超越之矢，超越是卓越之的。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党员干部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关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过硬的真本领”。进入新时代，党内外、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工作对象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特别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有不少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学习。要以新使命新挑战新要求为牵引，对知识来一次再丰富，对本事来一次再扩容，对能力来一次再升级，努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问题，走出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追求“三种境界”，注重把提高理论素养与增强党性修养、提升工作本领结合起来，坚持学以立德、学以资政、学以修身、学以益智、学以增才，努力提升为民服务、履职尽责、谋事干事的能力素质，不断增强奋斗新时代、奋发新担当、奋力新作为的实践本领。

（作者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某部政治委员）